

华东师范大学函授教材

中国现代文学讲义

(上册)

李西达 编

曹同本 审

2611

华东师范大学函授部

B25

华东师范大学函授教材

中国现代文学讲义

(初稿)

上册

玉西彦 钱国荣 陈孝全 翟同泰编

华东师范大学函授部

1959

目 录

第一章 魯迅	1
一、魯迅生活和思想发展的道路	1
二、論阿Q和他的悲劇	9
三、从《药》看魯迅創作的特色	81
四、讀《故乡》	43
五、《祝福》——一个令人顫栗的回顧	50
六、魯迅小說中的知識分子	59
七、論《故事新編》	71
八、魯迅雜文的民族特色	98
九、从《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看魯迅初期雜文的思想特色	104
十、《朝花夕拾》	111
附录：主要參考資料	123
第二章 瞿秋白	124
一、瞿秋白的生平及其思想发展的道路	124
二、《饿乡紀程》和《赤都心史》	137
三、雜文	143
四、馬克思主义文艺理論和俄罗斯—苏維埃文学的傳播者和翻譯家	157
五、中国馬克思主义文艺批評的奠基人	160
六、中国无产阶级文学和文艺大众化的倡导者	138
七、結語	175
附录：主要參考資料	180

第三章 郭沫若	181
一、郭沫若的生平和创作	181
二、《女神》	190
三、《屈原》分析	205
四、《虎符》	218
附录：主要参考资料	223
第四章 茅盾	224
一、茅盾的生平和创作	224
二、《子夜》	239
三、《林家铺子》	302
四、《春蚕》	316
附录：主要参考资料	323

第一章 魯 迅

一 魯迅生活和思想发展的道路

列宁曾經称呼托尔斯泰为“俄国革命的鏡子”，因为在托尔斯泰的作品里，表现着俄国革命中农民的历史行动所处的矛盾状况：一方面，由于受到长期的压迫和欺詐，农民們积聚了无限的憎恨，渴望着打破教会和地主占有土地的旧秩序；另一方面，他們对于很多切身的問題，如：新生活是怎样的？怎样爭取？誰来领导他們？为什么要用武力去推翻沙皇政权？却采取着痴呆的办法，以为只要向統治者去哭泣、禱告、写請求書就可以达到目的。其实，岂只托尔斯泰呢，一切偉大作家，在历史上都尽着时代和社会的鏡子的作用。我們的魯迅自然也沒有例外。

然而，作为中国革命的鏡子，魯迅的情形，和托尔斯泰是不同的。在魯迅的生活和思想的发展道路上所明彻地反映着的，乃是中国民族为了求解放的战斗的历史状况。不仅是中国民族的受难、被辱、呻吟、啼号，尤其是中国民族的挣扎、苦斗、呐喊、怒吼——一个旧中国轉化为新中国的历程，在魯迅的全部作品里，保留着异常显著的迹象。所以，如果拿半个世紀以来的中国社会的轉变史，来跟魯迅的生活和思想的发展道路互相对照印証，便可以看出，时代的脉搏，是怎样的跟魯迅的生活和思想有着一致的跳动。

魯迅出生于1881年（光緒7年），在他的幼年和青年期，正当中国封建旧社会急遽地趋于崩溃，中国人民也加速地陷于双重剥削的惨境。殘破的封建主义阻碍着社会的前进，外来的帝国主义的侵略，又桎梏着民族資本主义的发展；这两种力量的結合，使中国民族窒息、于一种“世紀末”的苦悶。官僚士大夫們虽曾有过“变法图强”的起意

和努力，但“洋务运动”和“戊戌政变”并没有真正挽救这种日趋严重的民族危机。戊戌政变那一年(1898)，鲁迅18岁，正是他离开绍兴老家到南京去“学洋务”的一年。他生长在一个正趋没落的仕宦家庭里，他的“学洋务”，自然是为了适应时代的召唤。他最初进江南水师学堂，就是为了追随当时的维新运动；第二年改入江南陆师学堂所附设的矿路学堂，乃是为了水师学堂的功课简单不切实用；到日本后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乃是本于日本维新为医学革命的见解；最后中止学医，到东京改学文学，则是为了悟知医身体的病不如医心理的病的重要(参看《呐喊》自序)——凡此种种，都是有所为而为之。这种有所为的动机，便是他的现实主义。可以说，鲁迅一开始就是一个关心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的人，就是一个现实主义者。随着拟办文艺杂志《新生》(1907)的未果，他给《河南杂志》(程克、刘申叔等所办)撰稿，这可算他发表社会思想的开始(以前仅写过科学文章)。所作有《人之历史》，针对顽固派不信人由猿变的成见，阐明生物的进化和人类的起源；《科学史教篇》，针对国人对科学知识的缺乏，叙述自然科学的发达史；《文化偏至论》，针对当时的“洋务运动”，批评它的“倒果为因”，“惟枝叶是求”，而不注意到众人的自由解放；《摩罗诗力说》赞美反叛的浪漫诗人，如拜伦、雪莱、普式庚、莱尔芒托夫、裴多菲等，并且由此反对一切复古思想，认为“所谓古文明国者，悲凉之语耳，嘲諷之辞耳”，攻击“无为之治”的思想，认为社会不断前进，“生物不能返本”。在这初期的文字表现里，就充分显示出一个战士的姿态：反叛，追求进步，不满改良式的旧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1908年，和周作人合译《域外小说集》，内容多系被压迫民族和歌颂反抗的作家和作品，自然也是为了同样的目的。在这时期，鲁迅的思想，进化论和个性主义是他的基本：“固然，这种个性主义，是一般的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的幻想。然而在当时的中国……为着要光明，为着要征服自然界和旧社会的盲目力量，这种发展个性、思想自由、打破传统的呼声，客观上在当时还有相当的革命意义。”(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对鲁迅来说，这是他一个重要的开始。

魯迅是在1909年夏天回國的。最初3年，他服務於故鄉的教育界；1912年以後，便進教育部任事。在這時期，他的思想極少用文字表現。實際的情形是，辛亥年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是一種不徹底的革命，許多投機分子，乘機混入革命的陣營，一躍而為新貴，攀折革命的花木，採摘革命的果實。封建勢力幾乎有并吞革命的形勢，帝國主義（特別是日帝）又成為封建勢力的實際撐支者。從北京到地方，到處充滿着封建的腐臭。而魯迅，生活在這種空氣之中，自然感到異常的寂寞，意志也很消沉；用他自己的話說，乃是由懷疑而失望而悲觀了。直到1918年“五四”前夕，他的戰鬥的光芒才輝煌地展露。“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對絕望的絕望，自然是轉而為希望，這便是一個戰士的轉機。在偉大的十月革命的影響下，他提起了筆，加入了《新青年》的啟蒙運動，就在“五四”的前一年，写出了他的第一篇小說《狂人日記》。在這篇小說里，他銳利地攻擊着封建社會腐朽的傳統和罪惡的淵源。從這時候，到1926年的離開北京，他写出了收容在《吶喊》和《彷徨》里面的全部的創作小說，表現出異常燦爛的戰績。一方面，反孔教，反國粹，反“官場學者”和“御用文人”，反帝國主義的走狗和奴才，反壓迫和屠殺，反頑固和麻木；另一方面，則是歌頌光明，歌頌進步，歌頌希望，歌頌革命和戰鬥——不妥協，不姑息，是一個偉大的戰鬥者的最美的姿態。在這時期，正是中國思想界從第一次“偉大的分裂”（國故與新文化）到第二次“偉大的分裂”（新文化內部）的時期。所謂第二次分裂，“一方面是工農民眾的陣營，別方面是依附封建殘余的資產階級。這新的反動思想，已經披為歐化或所謂五四化的新衣服。”（瞿秋白）而魯迅，在第一次分裂時，他自然是站在新文化這方面的最勇猛的闖將；後來，他把自己初期的小說作品叫做“遵命文學”，所遵的就是領導“五四”運動的共產主義者的命令。在第二次，他同樣地站在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工農民眾的陣營里，對新的反動思想作着卓絕的戰鬥。作為一個革命的知識分子，敢于和封建勢力割斷關係，又和帝國主義割斷關係，並且進一步和反封建反帝的戰鬥中的退却分子及變節分子進行堅決的戰鬥，他必然將在自己

的面前发现新的道路——通往工农群众的阵营的道路。

鲁迅的作品，除了几乎全部的创作小说，第一个杂感集《热风》（1925）以及散文诗集《野草》（1927）都完成于这一个时期。特别是《野草》，里面收集从1924—1926年间的短篇抒情作品，内容虽然比较隐晦，不容易被人读懂，但在作者的思想的发展上，却占着很重要的地位，因为，它深刻地表现着作者在革命过程中悲观和痛苦的追求的心情。他悲观，由于他所接触到的现实和他所希望的不相符合；他痛苦，因为在这种情形上发现自己的无能为力。鲁迅的伟大，就在于他并没有在悲观和痛苦里沉没，反而能够通过悲观走向希望，忍受痛苦去学习“别种方法的战斗”。是的，在跨出了《野草》里面所流露的那种心情之后，这位伟大的战士便更前进了一步，开始着更有效的“别种方法的战斗”了。

这种“别种方法的战斗”是怎样的战斗呢？它就表现在鲁迅生活和思想发展的一个新阶段里。我们知道，1925年的“五卅运动”，是“五四运动”以后一个划时代的大事件。“五卅”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劳动群众的觉悟提高了，革命的力量扩大了，由于南方工人运动的巨大影响，北京的学生们也群起反对军阀官僚的统治，结果，酿成了“三一八”惨案。这是“五卅”后帝国主义者和它的爪牙走狗们又一次对中国人民的大屠杀。同年7月，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实际上由共产党所领导的反帝反封建（军阀）的联合战线——北伐，便宣告开始。而鲁迅，他就在这北伐军向北方迅速进展的时候，在封建军阀和“正人君子”们的压迫和围攻之下，离开北京，先到厦门，第二年年年初到广州。接着，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上海演出“四·一二”惨剧，反革命的阴谋家开始对工人和共产党员的屠杀；几乎是同时，广州也大举逮捕和屠杀革命青年；到了7月间，武汉便举行了反革命的“清党运动”。跟离开北京和厦门一样，由于反动势力的迫害，鲁迅又离开了广州，10月间到了上海。在上海，鲁迅更进一步靠拢共产党，直接接受了党的领导。现实的刺激，加上理论的研讨，尤其是得到了党的领导和帮助，使鲁迅的思想由矛盾冲突而趋于

明确統一。在《而已集》(1928)的題辭里,有这样的話:

這半年我又看見了許多血和許多淚,

然而我只有雜感而已。

淚擦干了,血消了;

屠伯們逍遙復逍遙,

用鋼刀的,用軟刀的。

然而我只有“雜感”而已。

可見這種血和淚給他的刺激是非常大而深的,使他更清楚地看到了反動派的面目,自然也就感覺到自己必須更進一步地投身到集体的斗争里去。“正是這期間,魯迅的思想反映着一般被蹂躪被侮辱被欺騙的人們的彷徨和憤激,他才从進化論最終的走到了階級論,从进取的爭求解放的个性主义進到了战斗的改造世界的集体主义。如果在以前,魯迅早就感覺到中国社会里的科举式的貴族階級和租佃官僚制度之下的农奴階級之間的对抗,那么,現在他就更清楚的見到那种封建式的階級对抗之外,正在发展着資本和劳动的对抗。”(瞿秋白)并且,他不仅把这两种对抗有机地加以連結,更进一步地認明了后一种反抗的根本意义,从此就确信新社会的創造者是新兴的工人階級,增加了新的勇气。由于这样的确信,所以正当当时思想界反映出“五四式的知識阶层的最終的分化”(一部分为資本家的走狗,另一部分便是革命青年),魯迅就立刻站到劳动人民这边,投身于新兴的社会主义的先进階級,坚决而勇敢地走上真正革命的道路。

大革命的暴风雨过去了,反動派和革命者的战斗,用一种新的姿态展开。这真是一场剧烈的生死斗争!在这场斗争里,一方面,是向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投降了的資產階級,以及封建地主在帝国主义的支援之下的联盟;另一方面,是工农大众和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的联盟。一方面,是竭力維持旧社会的秩序和剝削关系,屠杀和鎮压革命勢力;另一方面,是竭力顛复旧的社会秩序和破坏旧的剝削关系,使中华民族从悲慘的命运中求得解放。在共产党所領導的

革命陣營里有两个战斗部队：武的和文的。而鲁迅，便是文的战斗部队的英勇旗手。在以前，从进化論出发，他認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人必胜于老年人。”（《三閒集自序》）但随着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和社会阶级的显著分化，由于血的教訓，使他知道革命和反革命的划分，应该从阶级观点着手。因为有了这样明确的認識，他找到了坚定的立場，他的战斗也就更其沉着而勇敢。在这时期里，作为一个文艺界的战士，鲁迅翻譯了卢那卡爾斯基的《艺术論》及《文艺与批評》，法捷耶夫的《毁灭》，雅各武萊夫的《十月》，以及短篇集《堅琴》和《一天的工作》等，都是苏联的理論和作品。所写的杂文，則以《二心集》为起点，調子为之一新。尤其是，在行动上，如1930年2月的参加“自由大同盟”，3月的参加“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会，同时被浙江国民党反动派的省党部呈請通緝“墮落文人鲁迅”，1933年1月的参加“民权保障同盟会”，并被选为执行委員，6月間战友楊鋒被刺时，亲往万国殯仪館送殯，出門不帶門匙，以示决絕——这种种，都表现出他对革命的无畏的实践精神。

在鲁迅全部杂文中間，思想最正确、立場最坚定、态度最沉着的，便是从《二心集》以后的八个集子，包括《伪自由書》、《南腔北調集》、《准风月談》、《花边文学》，以及《且介亭杂文三集》。（二集和末集，为逝世后所出版）从这几个集子，我們可以看到，一方面是对于反革命陣營里一切丑恶的暴露和反击，另一方面便是对于革命和人民的无比的热爱和希望。我們不妨說，这一时期的鲁迅的杂文，是他同类作品的最后完成，自然也就是他在思想进程上所达到的最高境地。

不待說，到了今天，我們回头去看过去的先驅者的道路，觉得那方向是十分明显的；但在当时，整个身心背負着古旧的社会积习和傳統精神，如果没有不断地跨越自己的勇气和識力，很不容易进行那种艰苦的战斗，并且从战斗中获得輝煌的胜利的。这样的战士，在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中，在文化界和文艺界，鲁迅是一个偉大的存在。鲁迅的偉大，就在于能够不断地否定自己，跨越自己。在我們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偉大的战士，不是一个不知疲倦的探索者。“路漫漫其修

迄今，吾將上下而求索”，必須能夠不斷地求索，才能尋找到自己前進的道路。不待說，從魯迅輝煌的著作里，我們可以發現很多預見；不過必須看到，從起點到終點，他是經過了異常辛勤艱苦的探索的。他的思想，始終隨着時代的躍進而躍進。他是一個能夠堅持的異常執着的人；但他所堅持執着的，乃是為民族前途而追求進步的獻身精神。魯迅是一個最沒有成見或偏見的人，他那銳利的眼睛，始終注視着真理；而他的熾熱的心，也始終關切着國家和人民的命運。“先前，舊社會的腐敗，我是覺到了的，我希望着新的社會的起來，但不知道這‘新的’該是什麼，而且也不知道‘新的’起來以後，是否一定就好。待到十月革命後，我才知道這‘新的’社會的創造者是无產階級——現在蘇聯的存在和成功，使我確切地相信无階級社會一定要出現，不但完全掃除了懷疑，而且增加許多勇氣了。”（“答國際文學社問”）這幾句話，就充分地顯示出他追求進步的精神。魯迅之所以能夠勇敢地背叛自己的階級，成為无產階級的友人和戰士，就由於他認真注視真理和關心人民命運的緣故。

而且，魯迅思想的发展，乃是从战斗的生活實踐中出發的。前面已經說過，一開始，魯迅就是一個現實主義者——一個“最清醒的現實主義者”。（瞿秋白）因為，他的戰鬥，從來都是腳踏實地的，沒有幻想，沒有叫囂，沒有虛夸。“革命文學家，至少是必須和革命共同着生命，或深切地感受着革命的脈搏；”（《上海文藝之一瞥》）一個革命作家，如果不能和戰鬥的生活實踐相結合，那是很難寫出好的真正的革命作品來的。我們縱觀魯迅一生的經歷，便可以知道，不論在那一個階段，他總是以工作戰鬥，以行動戰鬥，從不徒托空言，不做“空頭文學家”；而每經過一次戰鬥，他的思想便上升一步。對於那些“做戲的虛無黨”，魯迅的指責自然是无情的；即使是對於自己的戰友們，他也不惜严厉的諍戒，告訴他們，革命是痛苦而尤其是現實的事情，“所以對於革命抱着浪漫蒂克的幻想的人，一和革命接近，一到革命進行，便容易失望，”（《對於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並且指明，“以為詩人或文學家高於一切人，他的工作比一切工作都高貴，也是不正確的觀

念。”(同上)还特别提醒“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这样的例证,简直举不胜举。而包含在这样的例证里的光辉的思想原则,只有从战斗的实践之中才能产生和发扬。

特别重要的是,鲁迅的战斗,“五四”时期是在共产主义者、到上海以后就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所以能和广大的人民群众的要求相结合。从一个没落的仕宦家庭出身,受尽世俗的冷漠和虐待,他把这种身受的痛苦和人民群众的更广大的痛苦相结合,然后在一定的阶级社会的关系之中,找到了原因,从而跨步前进,使自己成为人民群众的代言人。自然,这种结合和觉悟,并不是轻易获得的,他并不是一开始就认识人民群众的痛苦的根源和巨大的力量,“任个人而排众数”(《文化偏至论》)原是他最初的见解。即在写作包括象《阿Q正传》那样的杰作的小说作品时,他也还是一个未能摆脱个人主义思想影响的人。但一当大革命之后,在革命政党领导下中国人民群众的觉醒力量的显露,苏联革命后的成功和胜利,以及马列主义文艺理论的接触和介绍——这一切推动和启发了他,使他发现到新兴的无产阶级乃是人类的光明和希望的代表。因此,他就坚决地接受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站在一起,为人民群众而进行卓绝的战斗。“我们的劳苦大众历来只被最剧烈的压迫和榨取,连识字教育的布施也得不到,惟有默默地身受着宰割和灭亡。……知识的青年们意识到自己的前驱的使命,便首先发出战叫。这战叫和劳苦大众自己的反叛的叫声,一样地使统治者恐怖。”(《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劳苦大众的愚昧乃是黑暗统治的结果,但即使愚昧,也仍然有反抗;而且,他们一旦觉醒,便能产生伟大的力量。一个先驱者的使命,便是唤醒他们,并且为他们忠诚不息地服务和战斗。

不断地否定自己,跨越自己,不断地作着不知疲倦的探索;从战斗的生活实践出发,脚踏实地,不抱幻想,没有虚夸;在党的领导下,执行党的任务,和广大的人民群众的要求相结合,信任人民群众的智慧 and 力量,忠诚地为人民群众服务——这便是我们今天应该向我们伟大的战斗者和先驱者学习的。

二 論阿Q和他的悲劇

1

作者寫出作品，把它送到了讀者的手里，這作品便成為一種客觀的存在。包含在這種客觀存在的作品里面的思想意義和社會價值，可能跟作者最初的主觀意圖或動機不完全一致。所以，當我們評論作品時，應該分析客觀存在的作品本身，從作品本身得出結論。當然，這並不是說，在我們面對作品時，就完全用不到去探索作者的意圖或動機了。不論在怎樣的情形下，作品總是作者的創造物；對作者的意圖或動機的探索，看一看客觀存在的作品跟作者最初的主觀意圖或動機的距离（如果有距离的話），不僅可以增加我們對作品本身的了解，也可以增加我們對作者的了解。阿·托爾斯泰說：“寫作的過程——就是克服的過程。你克服着材料，也克服着你本身。”從作者最初的創作沖動，通過題材的選擇，人物的刻畫，到作品最後的完成，這是一個很複雜也很艱辛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每個作者的經歷雖然都不盡相同；但對作者的了解，總是有助於對作品的了解的。

我們研究和評論魯迅的代表作品《阿Q正傳》，當然也應該這樣做，而且已經有人這樣做過了。一則，現在距離《阿Q正傳》的寫作年代還不算太久遠，當時歷史和社會環境的情況還保留在我們的記憶里，參考材料也比較多；再則，魯迅自己對《阿Q正傳》和它的寫作情況也有過一些解釋和記述，在寫作《阿Q正傳》的同時，也還寫了另外一些可供參考的作品（包括小說和雜文）。這就給了我們很多方便，我們當然應該充分利用這些方便。

什麼是魯迅寫作《阿Q正傳》最初的意圖或動機呢？很多研究者都指出過了——是為了揭發“國民性”。魯迅自己也說得非常明白，他在寫於1925年的《俄文譯本《阿Q正傳》序》里說道：“我雖然已經試做，但終於自己還不能很有把握，我是否真能夠寫出一個現代的

們国人的魂灵来。”又說道：“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在中国实在算一件难事……我也只能依了自己的觉察，孤寂地姑且将这些写出，作为在我眼里所經過的中国的人生”。到了1933年，他在一篇题为《再談保留》的杂文里，又說道：“十二年前，鲁迅作的一篇《阿Q正傳》，大约是想暴露国民的弱点的”。为了改变愚弱的国民精神而从事文艺运动的鲁迅，这样的写作意图和动机是非常自然的。我們知道，鲁迅对中国历史有过深刻而独到的研究，他認為从历史可以看到中国的魂灵和推测国家的将来；同时，他又是抱着热烈的希望经历了清末民初的社会变革的，結果，黑暗的现实使他的希望沉落为絕望，但又感到“絕望之为虛妄，正与希望相同”，不甘心自己思想中的黑暗，要和这种黑暗作“絕望的抗战”，从而轉生出希望。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对“国民性”的看法，是深刻的，但也就不可避免地带有悲观阴暗的色彩。在鲁迅初期的杂文里，揭露和批評这种愚弱的“国民性”的地方是很多的，又往往出于悲憤的口吻，例如在题为《杂忆》那篇文章里，指責受强者蹂躪的人民不敢向强者反抗的卑怯行为时，說：“卑怯的人，即使有万丈的憤火，除弱草以外，又能燒掉什么呢？”所以，在《两地書》里面的一封信里，他慨叹“二次革命”失敗后比“民元”时更其“坏而又坏”的情形，認為問題的关键便在于“要国民改革自己的坏根性”，主張“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則，無論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換，貨色照旧，全不行的”。作者的認識既是这样，那么，当他提起那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的笔来写《阿Q正傳》时，那意图或动机，不是非常明白的吗？

在这里，我們还应该特別指出，鲁迅对“国民性”的带有悲观色彩的看法，一方面固然是根据对历史的研究，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却究竟是根据切身的经历，就是他自己所說的“眼前所經過的中国的人生”。不用說，在写作《阿Q正傳》以前，从鲁迅眼前所經過的中国的最大的事件，是辛亥革命。在他看来，辛亥革命是失敗的，令人失望的；这种失敗，愈来愈明显，愈来愈令人失望。“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凱称帝，張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

于是希望、頹廢得很了”。这是他自己写在《自选集自序》里的話。辛亥革命的失敗，在当时的魯迅看来，便是由于“国民性”还没有改革的緣故。这种必須加以改革的“国民性”，虽然有它一定的历史渊源，但在辛亥革命中的可悲哀的表现，終究是一种最实际的感触。因此，一方面为了揭发“国民性”，另一方面也为了写出辛亥革命的实际；或者说，通过辛亥革命的实际来揭发“国民性”。就是怀着这样的意图和动机，魯迅写下了他的杰作《阿Q正傳》的。在一篇題为《論睜了眼看》的杂文里，魯迅說过这样沉痛的話：

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瞞和騙，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証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懶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滿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墮落着，但却又覺得日見其光榮。

接着，便說到了文艺：

中国人向来因为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瞞和騙，由此也生出瞞和騙的文艺来，由这文艺，更令中国人更深地陷入瞞和騙的大澤中，甚而至于已經自己不覺得。世界日日改变，我們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誠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它的血和肉来的时候早到了；早就應該有一片嶄新的文場，早就應該有几个凶猛的鬪將。

这些話虽然說在写作《阿Q正傳》之后，却正可以說明作者在写作《阿Q正傳》时的心情。因为痛心于用“瞞”和“騙”掩盖着的怯弱、懶惰而又巧滑的“国民性”，所以魯迅就以一个凶猛的鬪將的姿勢，真誠地、深入地、大胆地揭去“瞞”和“騙”的掩飾物，正视人生并且写出它的血和肉来。《阿Q正傳》便是在这样的意图和动机下所写出来的揭露性的作品。

2

魯迅的目的既然是在揭发“国民性”的弱点，要写出“国人的魂灵”，那么，他为什么要選擇阿Q这样一个赤貧的雇农来做他的主人

翁呢？正如有一位研究者所曾經提出的，为什么不采取一个別的人，例如一个普通的官吏或外交官，一个地主或士大夫的子弟，一个得意的买办或能干的西崽，一个什么教授或学者来做暴露或鞭撻的对象呢？果戈理的《死魂灵》和岡察洛夫的《奥勃洛摩夫》不都是那么做的嗎？那研究者的回答是，因为作者和农民有更早和更深的因緣，更关心农民的命運，尤其是因为敏感到当时革命的問題在于农民的是否覺悟和发动起来，所以他更希望和更为着农民，也更伤心于他們的弱点。这个回答，我以为是很确切的。魯迅在《英譯本《短篇小說选集》自序》里，曾說到自己因为生长于都市的大家庭，“从小就受着古書和師傅的教訓”，把劳苦大众看作幸福的花鳥：

但我母亲的母家是农村，使我能够間或和許多农民相亲近，逐渐知道他們是毕生受着压迫，很多苦痛，和花鳥并不一样了。不过我还没法使大家知道。后来我看到一些外国的小說，尤其是俄国、波兰和巴尔干諸小国的，才明白了世界上也有这許多和我們的劳苦大众同一命运的人，而有些作家正在为此而呼号，而战斗。而历来所見的农村之类的景况，也更加分明地再现于我的眼前。偶然得到一个可写文章的机会，我便将所謂上流社会的墮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陸續用短篇小說的形式发表出来了。

这段話里所說的“古書”，便是那些“瞞和騙的文艺”；同时，因受俄国、波兰和巴尔干諸小国的文学的启发所写下来的揭露上流社会的墮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的短篇小說，《阿Q正傳》当然也包括在內。从魯迅自己的話，我們便可以看出他和农民的关系，对农民的深厚的同情，以及提笔写作的动机和目的。因为接近农民，熟悉他們的生活，同情他們所受的压迫和痛苦，所以，在看到农民的弱点并且为之感到伤心时，也必然地会注意到农民的要求——即使还不能明确地看到农民的力量，也总是對他們寄托着希望，这也便是魯迅自己所說的“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的意思。如果没有这种对农民的了解和关心，自然也就不可能敏感到当时革命的問題在于农民的是否覺悟和发动起来了。

不过，在这个问题上，我們也不能忽略魯迅对历史的研究。因为本籍一般历史記載上的“涂飾太厚，廢話太多”，听不到人民的声音，察不出真实底細，他便从野史和杂記去窺看历史的真面貌。在魯迅初期的杂文里，也时常发表他研究历史的心得，例如在题为“灯下漫笔”那篇文章里，他写道：

中国人向来就没有爭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現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見不鮮的。中国的老百姓是中立的，战时連自己也不知道属于那一面，但又属于无論那一面。强盜来了，就属于官，当然該被杀掠；官兵既到，該是自家人了罢，但仍然要被杀掠，仿佛又属于强盜似的。这时候，百姓就希望有一个一定的主子，拿他們去做百姓——不敢，是拿他們去做牛馬，情愿自己寻草吃，只求他决定他們怎样跑。

根据这样的情形，魯迅便把中国人民的命运，归納为“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的循环。不用說，这样的看法是过于阴暗的，但也就說明了两点：其一，中国人民所遭受的封建专制統治的压迫和杀掠，是极端惨重的；其二，这种长期的殘酷的統治，使人民安于被压迫被杀掠的奴隶的地位。可是，魯迅对中国人民的命运的这种有些偏頗的看法，显然是由于他对中国人民历来的悲惨遭遇的激憤，在他忧伤的眼睛里，是閃現着悲痛的泪光的。正因为从历史中看到了老百姓受压迫和被杀掠的陈述，所以魯迅在当时的革命問題上，注意到农民群众的现状，把农民群众的是否觉醒和革命运动的是否联系到广大的农民，作为衡量革命成敗的标尺。在那篇写在《阿Q正傳》以前的《药》里，也写到了愚昧的群众，虽然那些群众并不是农民，但意义却是相通的——如果没有群众的觉醒，如果革命运动没有联系到群众，革命就不能成功。

此外，自然也跟外国文学的影响有关，如象魯迅自己所說的。关于受俄国、波兰和巴尔干諸小国的作家們的影响，魯迅曾經在好几个地方重复地提到，还說明了自己最喜爱的外国作家，俄国的是果戈里，波兰的是显克微支。我觉得，如果就《阿Q正傳》來說，显克微支